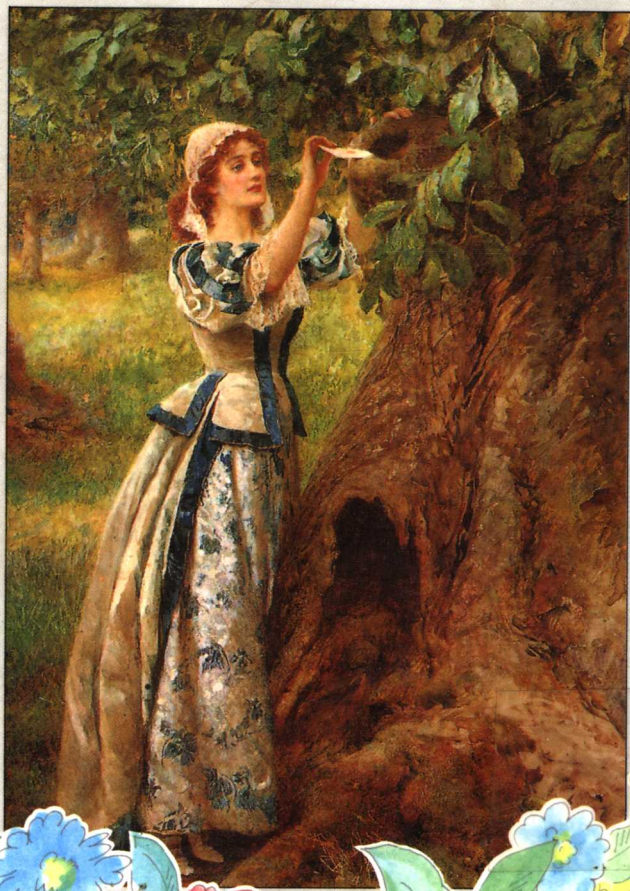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

[法]福樓拜／著 羅國林／譯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in Yu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包法利夫人／福樓拜著；羅國林譯。 --
初版。 --臺北市：林鬱文化，1992 [民81]
面： 公分。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10)
ISBN 957-9093-21-0(平裝)

876.57

81001594

新譯·世界文學名著 10

包法利夫人

NT\$200

福樓拜／著

1992年5月／初版

1999年3月／三刷

〈代理商〉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板橋市中山路二段291-10號7F之3

電話·02-2956-6521 * 傳真·02-2956-6503

〈出版者〉

林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4881號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電話·02-2230-0545 * 郵撥·16704886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萬順寮106號4F

電話(02)2664-2511 * 傳真(02)2662-4655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裝訂錯誤請寄各代理商退換，謝謝！■

ISBN 957-9093-21-0

Printed in TAIWAN

譯者的話

羅國林

我早就聽說臺灣有《包法利夫人》的譯本，只是至今未曾看到，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現在我的譯本能夠渡過海峽，在臺灣出版，可謂幸事。在這裏，我衷心感謝林鬱工作室的編輯同行；是他們給了我這個榮幸的機會。同時，我要誠摯感謝江西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張秋林先生，是他推薦了我的譯作。

臺灣既有《包法利夫人》的譯本，為甚麼還要出版拙譯呢？我想，這一方面是為了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是為了尋求譯作的完美。像《包法利夫人》這樣的世界文學名著，存在幾種不同譯本，不僅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事實上，目前在大陸，包括拙譯在內，《包法利夫人》已有四種譯本；相信以後還會有新的譯本問世。為甚麼要可惜人力、財力，做這種看似重複的工作呢？答案誠如剛才所言，就是要尋求譯作的完美。遼譯《包法利夫人》的譯者，一般不可能是其原著作者福樓拜先生那樣的文學大家；縱令是大家，由於漢、法兩種語言及各方面背景差別殊異，也不大可能一次遼譯就能產生與原著效果完全一樣的譯作。譯作之臻於完美，必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經過不同譯家，甚至幾代譯家嘔心瀝血的努力，相互借鑑，取長補短，方能在內容和藝術風格上，

達到最大限度地與原著相接近的水平。因此，一部名著的每一種譯本，只要其譯者具有紮實的功底，只要是誠實而認真地完成它的，都有不可抹煞的作用，都是一份貢獻。誠然，這裏所講的僅限於《包法利夫人》這樣的世界文學名著。一般的作品如果也花這麼多人力、財力來重譯出版，豈不是一種浪費？

寫到這裏，我想到大陸的翻譯批評。翻譯批評對於倡導健康的譯風，尋求完美的譯作，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大陸的翻譯批評過去開展得不夠，近年來有所進步。然而我總覺得，目前的翻譯批評存在某種偏向，往往只注重原著和譯著語言方面的具體比較，即從原著和譯著中各抽出那麼三兩句話，字字對照，評價譯著是忠實還是不忠實於原著。這種批評方式，當然也有某種作用，但應該說是低層次的。高層次的翻譯批評，應該首先著眼於譯著是否真正把握和再現了原著的藝術風格，尤其透過不同的嚴肅譯本進行比較和鑑別，促使譯家們努力追求惟妙惟肖地再現原著藝術風格和神韻的完美譯作。這項工作，祈願海峽兩岸的翻譯家和批評家們共同來做，以繁榮中國的文學翻譯事業。

我從事法國文學翻譯和研究將近二十年，越幹越覺得自己功力不足，因此要不斷在幹中學習。拙譯《包法利夫人》肯定有不足和謬誤，今有幸在臺灣出版，對我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誠望海峽對岸的譯家、批評家和讀者諸君，不吝批評教正，本人不勝感荷。

譯序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僅僅憑仗歷史的公證，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爲人類共享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傳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樓拜動手寫《包法利夫人》，是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一八五六年五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塗，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寄給《巴黎雜誌》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誌》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將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爲他的小說需要刪節，請他把刪節的全權交給編輯部。福樓拜未予理睬，僅在來函背面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五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節。及至十二月一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裏發生的場面（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裏出來後，乘出租馬車瘋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

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爲了不使編輯部爲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於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註脚：「審讀委員會認爲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爲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事情並未到此止步，接著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誌》出於我不贊同的某些考慮，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裏已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爲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後面發表的部分不負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這部轟動性小說，《巴黎雜誌》在發表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節，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得了！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收到傳票，審判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艾內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養的一條鷹犬，後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裏，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衆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後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這篇公訴狀儘管十分整脚，許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讀。它使我們看到，在

資產極權制度下，檢察機關怎麼不擇手段、羅織罪名，扼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達到鉗制輿論、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它是一個時代的回聲，不僅說明了那個社會制度及其專制政權的反動，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偏見和狹隘。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至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透過揭露令人髮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可謂聲譽卓著，而又雄辯機智。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於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微觀察生活的結晶，讚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個律師，在當時作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影響很大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受到輕罪法庭追究，指控我違背了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給你定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並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給你

定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面對《包法利夫人》這部傑作，面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裏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於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範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①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願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作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後又一版再版，而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

*

《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紅杏出牆，最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裡，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

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昭然若揭。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寫她的愛情故事，而在寫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後果，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戕害人性，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惡本質。

愛瑪出生於外省一個殷實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子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產階級，都把女孩子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後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時髦，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熱烈，想像豐富，在修道院裏，「修女們在訓誡時，反覆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恆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在她的靈魂深處，喚起了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欲主義的說教，只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一八三〇年前後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捲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透進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裡，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薰陶，成天滿腦子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身的環境和她日後的家庭生活，格格

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靡的種子，作成了墮落的溫床。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後的愛瑪及其生活道路，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樣子。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是個體面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里。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裏，她體驗到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裏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堂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後，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並不是個壞女人，儘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後，她還是一度發狠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在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給她帶來的只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才徹底崩潰了。她也曾一度試圖到宗教中去尋求抵禦情欲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甫，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於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歸於

徹底幻滅。社會給她造成了墮落的溫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扎時，在社會上卻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這樣，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虜獲物，最終墮落為不可救藥的淫婦。顯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墮落的泥坑，禍根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腐蝕和引誘。我們可以說，是那個墮落的社會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墮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於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於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唯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索，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欲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而一旦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抵債，並且張貼布告宣布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於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於稅吏，稅吏無動於衷；她求助於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占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冷酷無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年輕的生命。事實再清楚不過：包法利夫人是被資產階級社會逼死的——除了這個結論，人們還能得出什麼別的結論呢？作品所描寫的包法利夫人這個悲劇人物是一個典型，是被資產階級社會摧

殘的千千萬萬婦女的代表。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裏受罪、哭泣！」^②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章，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任何寫照都是諷刺，歷史是控訴。」^③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瑪的命運的描寫上。這部小說有個副標題，叫做《外省風俗》。除了愛瑪的生活經歷之外，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外省風俗畫呢？給人以鮮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外省資產者群醜圖。這裏有滿嘴「進步」、「科學」，實際上却不學無術，懷著政治野心，欺世盜名的藥店老闆奧梅；有自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實際上對人的感情一竅不通，淺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爾尼賢；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卻滿肚子男盜女娼，與奸商暗中勾結，飽肥私囊的公證人紀堯曼；有唯利是圖，奸詐狡猾，重利盤剝，置人於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貸者勒樂；有靈魂骯髒，腐化墮落，隨心所欲玩弄女性，縱情聲色犬馬的地主羅多爾夫；還有生活空虛，百無聊賴，整天擺弄旋床以消磨時光的稅吏兼消防隊長比內，等等。當然，鄉鎮

② 福樓拜：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四日給科萊夫人的信。

③ 福樓拜：一八五七年二月給普拉迪埃的信。

醫生包法利也應算其中一個，這是一個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遲鈍，麻木不仁，做過「名揚天下」的美夢，但終因醫術平常，只好安於現狀的人。夠了，在一個外省鄉鎮，數得著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上齊全了；要說缺，只缺一個鄉村教師，因為那個時代在鄉間，教師還不受人重視。作者把整個鄉鎮的頭面人物，寫得如此周全，幾乎一個不漏，不能不說是一種著意安排。這些人算得上鄉鎮的精英吧，可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坦蕩君子，沒有一個德才兼備之士，沒有一個有德性的角色！他們全都是蠅營狗苟之輩！一個鄉鎮是如此，推而廣之，整個資產階級，整個社會，不是可想而知了嗎？這就是爲什麼《包法利夫人》雖然寫的是外省一隅，卻具有震動整個統治階級的力量。

作爲外省風俗畫，作品中以濃重的色彩、渲染的筆調，描寫了一個「農業評比會」。這是當局宣揚成就、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一次盛會。會場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鳴槍放炮，一派在永維鎮難得見到的節日景象。就在這非凡的熱鬧氣氛中，各種頭面人物，上至省府參事，下至本地鄉紳，粉墨登場。其中，藥店老闆奧梅，上竄下跳，出盡風頭；教堂執事賴斯迪布都瓦，乘機向參加會議的農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撈外快；省府參事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說，大肆吹噓全國農村的進步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而羅多爾夫則鑽到二樓，甜言蜜語勾引包法利夫人，兩個人一個慷慨激昂，一個竊竊私語，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而主席台下的整個會場，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亂成一片。一個莊嚴隆重的評比會，變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鬧劇。不僅如此，在大會主席宣布的長

長一串獲獎者名單中，有一位給地主幹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乾的蘋果還多。身上穿著破衣服，兩隻手長年接觸穀倉的塵土、洗濯的鹼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發硬，疙裏疙瘩，合也合不攏。而她半個多世紀的辛勞所換來的獎賞，只不過是一枚僅值二十五法郎的獎章！作品中精心安排這樣一位被剝削制度壓榨乾的農婦，作為獲獎者的代表，不正是對省府參事所唱的高調，對這次所謂評比會的抗議嗎？會議結束後，頭面人物全都留下來大吃大喝，而群眾散去，「人人回到原來的地位，主子繼續虐待雇工，雇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這是多麼尖刻的諷刺，多麼有力的批判。而這種諷刺和批判所針對的，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是政府，是最高當局，甚至國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國的社會現實。難怪作品一問世，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遭到政府攻擊，報紙謾罵，教士仇視」，帝國政府迫不及待要拿作者問罪。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這部作品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成為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又一部傑作的根本原因。

*

作為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十九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又一部傑作，《包法利夫人》不僅思想內涵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批判效果，而且藝術風格上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國甚至世界文壇，獲得了普遍讚譽和高度評價。拉馬丁說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來讀到的最優秀的作品」^①；波特萊爾讚揚福樓

拜「肩負了開闢一條新路的使命」⁵；聖勃夫評論說：「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誌。」⁶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⁷；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則認為：「完美無缺的《包法利夫人》問世後，在文壇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⁸這些評價不約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藝術成就。

福樓拜把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當作小說創作的最高原則。他像司湯達爾和巴爾札克一樣，把小說喻為「反映現實生活的一面鏡子」。⁹他認為真實和美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意味着真實。雖說真實的東西不一定都美，但美的東西，永遠是真實的。」¹⁰「喪夫了真實性，也就喪失了藝術性。」¹¹這些論斷反映了福樓拜的藝術風格的基本傾向。但這種基本傾向並非福樓拜所獨具，人們同樣可以拿這些觀點，去衡量和評價其他現實主義大師們的藝術特點。福樓拜的獨創，在於他透過《包法利夫人》，把小說藝術的真實原則推到了「純客觀」的境界。他主張，作家寫小說，應該像自然科學家搞科學研究一樣，始

④ 拉馬丁：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日約見福樓拜的談話。

⑤ 《波特萊爾全集》第Ⅲ卷第五二三頁。

⑥ 聖勃夫：《包法利夫人》，一八五七年五月四日《世界箴言報》。

⑦ 左拉：《居斯塔夫·福樓拜》。

⑧ 愛琳娜·馬克思：《包法利夫人》英譯本導言。

⑨⑩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樓拜》。

終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作者的想像，即使讓讀者模糊地猜測到，也是不允許的。」作品中「一頁一行，一句一字，都不應該流露出作者的觀點和意圖的絲毫痕跡。」^①《包法利夫人》以前的小說，無論司湯達爾的《紅與黑》，還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在作品中作者處於主宰一切的地位，由作者敘述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背景，評價人物和事件；作者還經常借題發揮，抒發感慨或闡發哲理，甚至向讀者進行說教。總之，作者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在《包法利夫人》裡，這一切都不見了。作者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了。讀完這部小說，甚至很難弄清故事的敘述者究竟是誰。作品上卷第一章寫上中學的夏爾·包法利，其中有一句話：「夏爾當時的情形，現在我們恐怕誰也不記得很清楚了。」由此看，故事的敘述者似乎是夏爾的一位同學。但僅此而已，後面再也沒露出蛛絲馬跡。寫愛瑪的遭遇和命運，作者自始至終沒有出面發一句感慨；寫「農業評比會」那樣的場面，作者也沒有出面發一句議論。總之，作者把自己徹底從作品中排除了。他只是透過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把現實生活忠實地描寫出來，一切讓讀者去體會，讓讀者去下結論。這種「純客觀」小說，根植於前期批判現實主義的土壤之中，而為十九世紀後期的自然主義開闢了道路。左拉就特別推崇《包法利夫人》，稱之為「自然主義的典範之作」，並且透過對《包法利夫人》的評價，闡述了自然主義的藝術觀：「小說家

① 莫泊桑：《居斯塔夫·福樓拜》。